

豐富的文學史，痛苦的思想史

——讀商昌寶《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

● 袁洪權



商昌寶：《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因歷史環境、政治因素與人際關係的影響，共和國以來的部分文本和文學史事件，並沒有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中呈現出來。1980年代提

出的「重寫文學史」，便關注1950至70年代的具體文本和文學史^①。但也有作家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唐弢認為，「每一個從事文學工作的人都要注意當代文學，應當用《當代文學述評》代替《當代文學史》，在促進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我以為寫述評比寫史更重要。」^②施蟄存也同意其觀點，認為「凡是記載沒有成為歷史陳迹的一切政治、社會、個人行動的書，不宜誤用『史』字」^③。雖然文學述評中所保留的文學史料更豐富，可為文學史寫作提供多側面史料，為客觀評價事件提供基礎，但是，當代文學研究並沒有朝此路向走，它追求的是宜粗不宜細，存在不少「漏洞」。洪子誠、陳思和、孟繁華、程光燁、董健等的當代文學史著作都不盡「完美」^④。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商昌寶的《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以下簡稱《檢討與轉型》，引用只註頁碼)並沒有局限於梳理當

商昌寶的《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切合了研究界對共和國文學史、思想史的關注力度，對1950年代的文學史和思想史都有精當分析。它涉及了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即作家的檢討。

* 本文為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11YJC751112)和西南科技大學博士基金項目(10SX7150)的階段性成果。

《檢討與轉型》一書從歷史細節出發，挖掘歷史背後複雜的人事關係，選取個案具有經典意義，是對1950年代文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該書關注中國現代文學轉型背景，從作家檢討與檢討書入手。

代文學的歷史線索，而是立足於斷代文學史橫斷面的思想史考察，切合了研究界對共和國文學史、思想史的關注力度，對1950年代的文學史和思想史都有精當分析，是一部很有意義的學術著作，凸顯出清晰的「史實觀念」。

《檢討與轉型》涉及了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即作家的檢討。翻閱1950年代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文學》、《文藝報》、《說說唱唱》等，我們會發現作家檢討是那個時代的風景線，亦是共和國思想史視野中引人思考的史料。光明日報社還出版過幾冊《思想改造文選》，專收名人檢討。1951年高校思想改造運動、1952年文藝整風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都留下大量的檢討文字。當然，若不局限於公開資料，在各種檔案中亦可以發現大量檢討文字。從這些檢討文字背後，我們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歷史細節和人事。要豐富和完善文學史、思想史，需要我們在文字背後挖掘豐厚的歷史內容。《檢討與轉型》一書從歷史細節出發，挖掘歷史背後複雜的人事關係，選取個案具有經典意義，是對1950年代文學史、思想史研究的力作。

一 注重歷史的細節

目前，學術界對現代文學轉型已經形成了普遍共識，認為其最終表現是：「由作家自由創作變為國家計劃生產，文壇由多元轉向一元，作品由爭奇鬥豔化為整齊一

致。作家們告別各自早已形成的風格，從題材到形式，全面適應政治的要求，從而形成了文壇史無前例的新面貌，並且鋪平了此後十七年以至『文革』時期的文學道路。」（李新宇：〈序〉，頁4）如何切入現代文學轉型進行分析，研究者有不同的觀察，並會選擇不同的文學史料。但是，切入之後的敘述卻是他們面對歷史的態度反映。《檢討與轉型》關注中國現代文學轉型背景，從作家檢討與檢討書入手，體現出作者對歷史細節的縝密探問。

按于風政的說法，1949至1957年間知識份子「做得最多的事是懺悔」^⑤，也就是進行自我檢討。依照當時發行的《人民學習辭典》，「檢討」是「檢查思想或工作上的錯誤，並且深究根源所在」，「是比較深刻的批評、自我批評」^⑥。檢討書是一種獨特文體，甚至成為當時流行的應用文。中國人民的文盲率高，「代寫」檢討書竟然成為當時地攤文化人的謀生計策，「幾乎在中國每一城鎮郵局門口那些代寫書信的捉刀人，都與時俱進地擴大了經營範圍，新增了代寫檢討的業務……代寫檢討都明碼實價：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檢討兩角，保證能一次過關的深刻檢討五角。」（頁25）《文匯報》還刊登過一篇有關「檢查」的寫作指南，包括「檢查提綱的內容與寫法」、「檢查提綱的要求」、「應防止的幾點偏向」^⑦。可以說，「檢查」或「檢討」完全成為「應用文的一種格式」^⑧。

李新宇認為，檢討書是「一種特別的文本，包含了豐富的時代文化密碼，要考察那個時代作家的精神

狀況，它的價值的確是別的文本無法替代的」(李新宇：〈序〉，頁5)。沙葉新曾這樣寫道^⑨：

在中國，凡是在那風雨如晦、萬馬齊喑的年代生活過的人，他很可能從沒受過表揚，但不太可能沒做過檢討；他也很可能從沒寫過情書，但不太可能沒寫過檢討書。連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開國元勳都做過檢討，連鄧小平、陳雲這樣的輔弼重臣都寫過檢討書，你敢說你沒有？上自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中及公務人員、知識份子，下至工農大眾、普通百姓，更別說「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了；無論你是垂死的老者，還是天真的兒童，只要你被認為有錯，便不容你申辯，真理始終掌握在有權說你錯的領導和自認永遠對的領袖手中，自己只得低頭認罪，深刻檢討……

其實，回到共和國歷史語境，我們發現：「檢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如前文所引，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都要學會寫檢討。這一現象也延續到當前，省級領導幹部犯錯，還得在媒體進行「檢討」。所以，作為獨特文化現象，檢討文化及檢討書應成為研究共和國文學史、思想史的重要課題，恰如商昌寶說的，「應成為研究這一時段政治、歷史、文化、思想和文學等無法繞開的課題」(頁1)。

1949年後，「思想改造」迅速成為廣泛流行的常用詞，常用詞典為推進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積極配合新詞傳播，如《續編新知識辭典》和《人民學習辭典》都對此詞有精確的解釋^⑩。其實，「思想改造」的核心，

「就是以無產階級的思想取代所謂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以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思想、立場、觀點和方法，以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集體主義，以工農群眾的革命實踐，來改造和取代所謂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客觀主義、唯心主義和超政治超階級的純業務主義」(頁10)。顯然，改造的對象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檢討書。

因此，商昌寶選取檢討及檢討書作為研究對象，抓住了共和國文學史發展的脈絡。他對檢討文本進行了分析，不僅看到顯在的檢討文本，包括「自我批評」、「自我批判」、「檢查」、「交代」、「思想總結」、「思想匯報」、「學習總結」、「自傳」等，而且注意到「隱晦文本」(姑且叫做「潛在檢討書」)，即「序」、「跋」、「前言」、「後記」等(頁27)。要是忽略對細節的關注，檢討文本存在的樣式就會被淹沒。

商昌寶的著作從歷史細節處發現豐富的史料，為勾勒共和國文學史、思想史提供了新的文本基礎。當然，檢討及檢討書涉及心理學、政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知識，要真正研究這類文本有很大難度。這或許是商昌寶以及研究界今後持續不斷的課題之一。

二 考察視角獨特

《檢討與轉型》考察了如下兩個相關的問題：作家檢討與現代文學轉型有甚麼關係？作家的檢討是否

《檢討與轉型》考察了兩個相關的問題：作家檢討與現代文學轉型有甚麼關係？作家的檢討是否導致了現代文學的轉型？研究作家檢討與現代文學轉型的內在關聯，是為了在文學史關注中還原當時的歷史。

商昌寶敏銳地看到作家檢討書背後複雜的「文化意蘊」。他認為1950年代的作家檢討存在着「真假共存」的局面，那是檢討者和把關人的默契配合。政治及意識形態需求使檢討書寫作呈現出種種「應用文體」特徵。

導致了現代文學的轉型？研究作家檢討與現代文學轉型的內在關聯，其實是為了在文學史關注中還原當時的歷史。商昌寶認為，「事實上，無論怎樣努力，歷史的本來面目都是不可能完全復原的」（〈導論〉，頁15-16）；在試圖接近目標的過程中，他希望能夠使文學史及思想史的豐富性、痛苦性得以呈現。《檢討與轉型》從作家檢討書這一對象出發，但作者並非局限於對作家檢討書的考證，而是同時關注檢討背後豐富的歷史內容。謝泳曾打算寫《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史》，但面對「思想改造」運動的歷史考察，他發現有三方面內容必須注意：「一、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基本態度。二、思想改造。三、思想改造運動」^⑩。「思想改造」的背後，涉及到執政黨及人民政府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以及知識份子在歷史語境中的適應能力及對策。因此，檢討是「思想改造」的組成部分之一，必須予以關注。

當工農成為黨的重要力量後，黨對知識份子的態度發生明顯改變。延安整風以後，知識份子一直被批判。毛澤東發表過如此指示^⑪：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甚

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既然黨的領袖有如此看法，黨對知識份子也就自然而然採取不信任態度。1948年，為迎接大量知識份子到來延安，中共積極組織「訓練班」、「革命大學」等，「逐批地對已有的知識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規模的辦，目的在爭取大多數知識份子都受一次這樣的訓練」^⑫。共和國成立後，黨把地區、地域經驗上升為國家經驗，延安經驗由此得到推廣。

不同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有着不同人生經歷的作家，面對「思想改造」浪潮均表現出不同的心態。在《檢討與轉型》一書中，商昌寶敏銳地看到作家檢討書背後複雜的「文化意蘊」。他認為1950年代的作家檢討存在着「真假共存」的局面，「當時的確存在檢討的真誠與虛假的問題」（頁19）。事實上，在1957年「雙百」期間，傅鷹就為其曾經寫過的檢討書〈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公開「翻供」：「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改造兩字，和勞動改造聯在一起。……現在所謂『改造』，就是要人在甚麼場合，慷慨激昂說一通時髦話，引經據典，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聽不懂的話去說人人都懂的事？」^⑬作家蕭也牧也曾對「檢討」有過公開的質疑：「那種對我幾篇作品的批評，我以為是至少有點對待敵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的。這主要的倒不在於批評的當時給被批評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在於它所產生的更廣泛更深刻的後果——它在社會上所形成

的一種空氣，使被批評者再也不能『復活』，並且給予其他的作者造成了一種無形的威脅。」^⑥

這引發我們思考：傅鷹、蕭也牧在「思想改造」期間為何要違心地寫檢討？其實，檢討涉及誰檢討、檢討甚麼、檢討的「把關人」、檢討的目的及意義等多重因素。多數知識份子成為檢討者，但檢討甚麼、怎麼檢討，並不是由他們說了算。這需要把關人的把關。檢討者和把關人以檢討通過與否為最終目的，至於檢討中怎麼把握，那是檢討者和把關人的默契配合。檢討者不過關，即把關人無法完成黨的任務。這樣的政治及意識形態需求使檢討書寫作呈現出種種「應用文體」特徵，並非出自寫作者的真心。因此，商昌寶認為，「檢討書自產生以來，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揚棄和補充的過程，在各個時期、各個問題上的表現也不盡相同，但一些基本要素卻始終相生相伴的，因此稱其為八股，也不為過。」（頁30）對這種新式的「八股文」，商昌寶將其基本要素歸結為：「錯誤事實」、「上綱上線」、「追根溯源」、「思想參照」、「整改舉措」、「總結展望」（頁30-42）。每份作家和學者的檢討文字，都有這些基本的要素。

一般來說，檢討者對所謂「錯誤事實」都非常謹慎。一方面，檢討者要面對把關人的把關。沒有錯誤事實，說明檢討不真實。在檢討過程中，把關人可以對錯誤事實作認定。檢討者知道把關人清楚他的歷史，檢討時他就刻意舉出錯誤事實，甚至羅列更多的「證據」。所以，「檢討書中都要體現出自己事實上犯

了這些錯誤」（頁32），才能使檢討獲得通過。

另一方面，把關人還得面對上級黨組織。他們都是黨嚴格篩選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充當。我們在翻閱歷史資料中發現，把關人都是組織信賴的、有革命經歷的，但文化程度相對比較低的人。怎樣有效地和這些人打交道，成為知識份子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技能，其中之一就是檢討者要在檢討中對錯誤事實給予巧妙的定性，即「上綱上線」。商昌寶從檢討書中發現，定性有基本規律，普遍的做法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就低不就高」和「就多不就少」。檢討者明白，「凡事都要有一個限度，超過限度反而適得其反」（頁34）。

「追根溯源」就是挖掘錯誤的根源。檢討者在錯誤思想根源指向上，都針對自身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社會因素、思想內容、階級範圍等（頁35）。對這些因素作深刻分析和批判，目的就是「求得改造者的認可，保證迅速過關」（頁37）。

在接下來的「思想參照」中，檢討者要麼引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相關話語，要麼從某些領導的講話、文件、批示中作引用，「為自己所犯錯誤尋找一個正確的思想標竿，以此映照出錯誤本身的面目」（頁37）。

在「整改措施」中，檢討者必須表達改正決心，並明確努力方向，給出具體措施。改正的方向要落到實處，自然不能空話連篇。

所有檢討書還都有一個被稱為「總結展望」的結尾，用語謙虛，態度誠懇，表達檢討者對檢討書寫作

怎樣有效地和把關人打交道，成為知識份子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技能，檢討者要在檢討中對錯誤事實給予巧妙的定性，即「上綱上線」。商昌寶從檢討書中發現，定性有基本規律：「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就低不就高」和「就多不就少」。

的基本認識，兼及對未來的展望和號召。正是在這樣的「謙虛和誠懇」中，知識份子喪失掉其思想與人格。

三 經典個案的選取

描述共和國「新秩序」時，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專家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曾說^⑥：

誰也沒有料到共產黨軍隊的勝利如此迅猛，也沒人料到能夠避免內戰升級的極度痛苦。雖然中國面臨着一大堆難題，如驚人的通貨膨脹、數百萬難民、土地改革只是局部完成、毫無經驗的幹部進入國家機關，以及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等等，但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對於長期戰爭的結束感到由衷的欣慰。

這裏的「誰」、「絕大多數中國人」，其實都是指知識份子。要了解這一點，選擇某些知識份子進行個案研究成為最佳選擇，正如林賢治所說：「要充分了解中國知識份子，必須重視個案研究，重視個體心態——人格的研究。」^⑦然而，對商昌寶來說，「在有限的篇幅內，如何選取典型是一個關鍵問題。或者說，選取哪些有代表性的作家才能夠完整地呈現這一時期文學轉型的基本面貌是至關重要的。」(〈導論〉，頁15)最終確定對象時，商昌寶依據的是1940至5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類別分析，直接來源於郭沫若在1948年發表的〈斥反動文藝〉一文^⑧。

在這裏有必要稍微介紹一下〈斥反動文藝〉一文的寫作背景。

1947年11月，郭沫若潛入香港蟄居。他受中共保護，等待進入解放區。此時，政治敏感的郭對黨的意識形態把握精準，使他對中共保持着堅定態度。在文藝觀點上，「積極提倡『以人民為本位』的人民文藝，排擊形形色色的反動文藝，熱烈讚揚和宣傳解放區文藝作品」^⑨，成為他的重要主張。所以，他把作品推薦看得很重要，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等是其重點讚頌的作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郭對生活在國統區的部分文人，表達出他的憎惡。郭在1948年寫作〈斥反動文藝〉，正切合了他對反動作家的「關注」。

商昌寶認為，「無論是借革命的勝利而平步青雲的體制內左翼知識群體，還是作為革命『同路人』進入體制內卻處於邊緣的『進步』知識群體，或者遠離革命而退守書齋的自由知識群體」，面對政治新格局，「都要進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檢討」(頁1)。在第二至五章中，商昌寶以「反動作家」、「進步作家」、「國統區左翼作家」、「解放區作家」為類型，遵循着左翼文藝界對1940年代作家的定位，而這樣的定位在日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也進入了運動主導者的思想框架。

在「反動作家」中，商昌寶以朱光潛、沈從文、蕭乾於1946至1957年的人生經歷為參照，深入分析自由主義作家在歷史中的沉淪。不管朱光潛、沈從文、蕭乾怎樣深刻寫檢討，新政權並沒有充分信任他們。即使曾獲短暫信任，但自由主義文人與左翼文人的「交惡」，也導致他

商昌寶對1940至5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類別分析，直接來源於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一文。商昌寶以「反動作家」、「進步作家」、「國統區左翼作家」、「解放區作家」為類型，遵循着左翼文藝界對1940年代作家的定位。

們遍體鱗傷。所以，「反動作家」最終在檢討聲中退出政治與文學的舞台。不過，他們在退守中也有「防守」：朱光潛能保持「未泯的學人意識」，「在思想意識裏，他並沒有真正服膺強加給他的那些批判」（頁63），擁有有限的學術話語；沈從文在政治高壓下「被動選擇」，放棄文學理想，沉默檢討，「從悔罪方法上通過任何困難，留下餘生為新的國家服務」^②，最終成為中國服飾研究家；蕭乾比沈從文、朱光潛年輕，雖獲得短暫信任，成為「合格的人民的吹鼓手」（頁108），但長遠來看，他的「不自覺流露的現實主義」（頁110），與「思想改造」的宗旨形成對照，無法逃脫「陽謀」誘惑，「不但被解除了職務，還被下放到農場勞動，成為名副其實的『陽謀』的犧牲品」（頁114）。

相對於「反動作家」，「進步作家」的命運更有意思。「進步作家」是文藝戰線上的「統戰對象」，新政權需要他們裝點文壇。對當政者來說，他們在思想上雖存在不足，但其思想跟革命時期的中共有一致性。不過，在新的歷史時期，「進步作家」的思想需要提高。所以，一方面，新政權給予他們政治優待，有頭銜和待遇；另一方面，文藝界領導人會對這些作家進行鞭策，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有錯誤思想，警醒他們要不斷學習政治，不斷進步。巴金、老舍、曹禺在新社會都得到這樣的「新生」。

不過，他們的「新生」是以犧牲其文學風格和成就為代價的。政治上「進步」了，文學上卻大踏步地

「下滑」：「那個曾經有才華、有個性、真誠的巴金，因為進入了體制內，在1949年後確發生了令人遺憾的質變」（頁137）；老舍的創作，「大凡改的越多的，劇本的質量就越差，舞台的生命力就越弱。而改的越少，劇本的質量就相對越高，舞台的生命力也越長久」（頁161）；而在圓滑與世故中，曹禺消失掉「通靈寶玉」，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的，「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甚麼，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摩領導的意圖……」^②

「國統區左翼作家」和「解放區作家」同屬革命陣營。由於分工不同，導致他們長期處於分割狀態，這也使他們對文學的理解存在差異。1940年前進入邊區的作家，大多數有着國統區和亭子間的經驗，他們對「國統區左翼作家」保持友善態度，擁有自己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1940年後，延安邊區培養並形成新作家群體，即年輕一代的「解放區作家」。他們對「國統區左翼作家」則抱着敵視和貶斥的態度。在中共領導人看來，「國統區左翼作家」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非常左翼的國統區文藝工作者夏衍身上有，革命低落時脫黨的文化部長茅盾也有，對毛澤東思想有偏差性理解的胡風更有。所以，一旦出問題，這些人仍充當檢討的發言人和示範者，給人警示意義。只不過，他們的檢討與「反動作家」有着本質的區別，他們屬於「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內部矛盾』」（頁207）。但胡風走得更遠一些，因不聽從意識形態建設的「安排」，始終從心靈深處抵

一方面，新政權給予進步作家政治優待；另一方面，文藝界領導人會對這些作家進行鞭策，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有錯誤思想，警醒他們要不斷學習政治，不斷進步。巴金、老舍、曹禺的「新生」是以犧牲其文學風格和成就為代價的。

個案的選擇，貫穿的是商昌寶敏銳的思想史眼光和細膩的思想史體驗。表面上，作者是對這些作家及其檢討進行研究，但在這些表象背後，是對知識份子思想史開展斷代史研究。

制毛澤東思想，最終被推向歷史的「審判台」。

解放區兩位顯示出實績的作家——丁玲和趙樹理，本是最有實力的作家；共和國初期，他們儼然是文藝界的核心成員。但因為思想的複雜性，致使他們在共和國文藝建構中，顯示出異質性。本受着五四新文學的薰染，丁玲有她對文學的理解，張揚個性，不時流露出「個人主義」，與黨性標準形成強烈對比，不同時段，丁玲充當了「有問題暫時未弄清的人」、「反黨小集團」、「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頁284)等角色。趙樹理以問題小說反映現實，作品帶有現實主義色彩，雖然他被確立為「方向」(改造目標)，但新形勢下也陷入了困惑，對他來說，「愈深入生活就愈寫不出符合主流意識需要的新形象」(頁285-89、301)。正如後來的評論者所說，趙的「農民啟蒙意識」表達了他的「樸實」，他的「固執」，他的「堅毅」^②，但這些可貴的個人品質是不是黨的文學所需，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反動作家」、「進步作家」、「國統區左翼作家」和「解放區作家」，在概念區分上其實有着承襲關係。比如「進步作家」、「國統區左翼作家」、「解放區作家」，其實會有重疊，丁玲、周揚就是這樣的文藝家。顯然，這樣的區分有不盡完美的地方。正如商昌寶所說，「雖不盡完美，但也可以說，既充分考慮了代表性，又兼顧了現代作家的思想主流」(〈導論〉，頁15)，並呈現出「最後的選擇可謂殊途同歸」(頁309)。

四 文學史背後思想史的「穿透力」

從事共和國文學史研究，不僅要關注文學史，還得關注思想史。《檢討與轉型》立足於共和國文學史研究的同時，也挖掘了思想史的一些核心問題。前文已述，此書選擇的個案，是1940至50年代的當代文人。個案的選擇，貫穿的是商昌寶敏銳的思想史眼光和細膩的思想史體驗。表面上，作者是對這些作家及其檢討進行研究，但在這些表象背後，是對知識份子思想史開展研究。

共和國成立後，來自國統區的知識份子(不管是「反動作家」，還是「進步作家」和「國統區左翼作家」)與來自解放區的知識份子(延安解放區作家)，表面上實現了「空前的團結」，實現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被稱之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③)的政治目標，但表象背後的事實是怎樣的呢？近年來，隨着常任俠的《春城紀事》、宋雲彬的《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以及《胡風全集》、《沈從文全集》、《王林日記》、《阿英日記》、《丁玲日記》等的披露，我們發現，事實當然是複雜的。不同區域作家之間的「間隙」、同一區域不同文藝觀作家之間的「間隙」，甚至文人間的個人糾紛等，都長期存在。從知識份子的個性發展來說，《檢討與轉型》一書中的個案都帶有「悲劇性」，商昌寶對此帶着痛惜的心情，認為「將一切問題都推之『極左』政治的大門內，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在反

思和追問悲劇的原因時，除應繼續關注政治和社會等客觀原因外，也不應忽略和忽視作為社會人的主觀因素」(頁313-14)。

在追問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人格時，商昌寶亦有獨特發現：

現代中國雖歷經三十餘年的發展，但是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五四」啟蒙現代性並沒有演化為作家群體的本體性和終極性的精神追求和價值準則，或者說在他們思想和精神深處，傳統中國的文化基因並沒有隨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灰飛煙滅，而是喬裝打扮、改頭換面地、頑強地潛伏起來，一旦遇到合適環境，便會恣意地、不加收斂地瘋長起來。(頁314)

話雖顯得沉重，但卻是思想史體驗的真實話。

在關注檢討書的同時，商昌寶注意到現實利益驅使與活命哲學在思想史中的意義。毋庸置疑，在共和國初期，社會主義革命固然還沒有到暴風驟雨的時代，但無疑已經進入了「請客吃飯」的階段。既然是「請客吃飯」，客人來後就要「安排」。黨對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有自己的定位，其安排亦體現了他們與黨的親疏關係。作為中轉站的香港成為作家和知識份子聚集地，但哪些人能夠進入香港以及哪些人先到香港，早在地下黨的精心安排中。

即便他們進入北平，也有嚴格區別，包括住宿和飲食。在住宿方面，「郭沫若、茅盾、葉聖陶、曹禺等最高一級的住北京飯店、六國飯店等，次一等的住翠明莊等，蕭乾等則住檔次一般的亞洲飯店」；

在飲食方面，「蕭乾等吃小灶，黨員吃大灶啃窩頭」(頁102)。因此，不難想像，「無論是自由主義作家，還是左翼作家，事實上都是受着現實利益的驅動」：「被排斥在體制外的想通過頌歌、檢討和批判進入體制內，被置於體制邊緣的想通過頌歌、檢討和批判保住現有地位並伺機進入到體制核心，在體制核心的則通過頌歌、檢討和批判獲得更鞏固的地位並借機打擊和排斥那些不同幫派的人」(頁312)。

知識份子(包括作家)也是人，在政治功利及物質利益、精神利益驅使下，最終放棄本應具有的主體人格、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等能力，成為物質利益的「寄生蟲」，也不稀奇。更何況，在高壓政治時代，人們可能有內在的心理壓抑感和恐懼感，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本能，活命哲學會慢慢生長起來。因此，商昌寶認為，對於苟活者我們不應嚴厲苛責，但對那些以死抗爭的人，「應該為其大唱頌歌」(頁312)。

但是，1940至50年代的現代文學轉型，與作家精神價值的缺失有關。如果文藝界和知識界多幾個林昭、遇羅克、王申西、李九蓮，中國當代的歷史或許依然如此沉重，但精神世界或會有一抹亮色。面對1949至1957年的歷史，文學史料呈現出來的豐富背後，是我們閱讀思想史中沉重的一頁。這是筆者閱讀《檢討與轉型》最大的感受。我們為那一代知識份子人格的整體缺失感到遺憾，但歷史並非在苛責中前行，它需要深入反思。所以，商昌寶提出建立「檢討學」，探討「檢討學」的價值及學術意義，更值得後來者繼續前行與深入挖掘。

我們為1950年代知識份子人格的整體缺失感到遺憾，但歷史並非在苛責中前行，它需要深入反思。商昌寶提出建立「檢討學」，探討「檢討學」的價值及學術意義，值得後來者繼續前行與深入挖掘。

註釋

- ① 陳思和及王曉明認為，「我們今天提出『重寫文學史』，主要目的，正是在於探討文學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於通過激情的反思給行進中的當代文學發展以一種強有力的刺激。」參見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頁4。
- ② 唐弢：〈當代文學不宜寫史〉，載《唐弢文集》，第九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頁494。
- ③ 施蟄存：〈關於「當代文學史」〉，載陳子善、徐如麒編選：《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頁525。
- ④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孟繁華、程光輝：《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⑤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633。
- ⑥ 陳北歐編著：《人民學習辭典》（上海：廣益書局，1953），頁507。
- ⑦ 參見洪濤：〈對寫好檢查提綱的意見〉，《文匯報》，1952年9月1日。
- ⑧ 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100。
- ⑨ 沙葉新：〈「檢討」文化〉，《隨筆》，2001年第6期，頁4。
- ⑩ 李進等編：《續編新知識辭典》（上海：北新書局，1953），頁259；陳北歐編著：《人民學習辭典》，頁214-15。
- ⑪ 謝泳：〈思想改造〉，載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23。

- ⑫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解放社編：《整風文獻》（煙台：膠東新華書店，1948），頁222-23。
- ⑬ 〈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和改造知識份子及對新區學校教育的指示〉，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編：《一九四八年以來的——政策彙編》（北京：中共中央東北局，1949），頁228。
- ⑭ 引自龔育之：〈毛澤東與傅鷹〉，載傅鷹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編：《中國知識份子的光輝典範：傅鷹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45-46。
- ⑮ 蕭也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人民文學》，1956年第7期，頁57。
- ⑯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尹慶軍等譯：《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328。
- ⑰ 林賢治：《五四之魂：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84。
- ⑱ 郭沫若：〈斥反動文藝〉，載荃麟、乃超等：《文藝的新方向》（香港：生活書店，1948），頁19-22。
- ⑲ 秦川：《郭沫若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337。
- ⑳ 沈從文：〈四月六日〉（1949年4月6日），載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頁25-26。
- ㉑ 吳祖光：〈掌握自己的命運——與曹禺病榻談心〉，《讀書》，1994年第11期，頁57。
- ㉒ 李輝：〈清明時節〉，載《李輝文集》，第一卷，〈滄桑看雲〉（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頁283。
- ㉓ 劉增人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頁499。

袁洪權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為西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教師。